



阳区村落民俗文化志系列丛书

ongBa MinSu WenHua Zhi
东坝
民俗文化志

北京民俗博物馆 编

东坝民俗文化志

北京民俗博物馆 编

民族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
批准号 05BSH030

《东坝民俗文化志》编委会

学术顾问：刘铁梁 王文和

主 审：黄晓伟

主 任：金宏图

主 编：孙爱军

执行主编：李彩萍

编 委：（按音序排列）

程安霞 关 昕 李 超 林 静

田莉莉 王均霞 王 媛 杨 英

统 稿：关 昕 白永芳

摄 影：杨 英

序言

刘铁梁

继《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之后，北京民俗博物馆又完成了《东坝民俗文化志》的书写，这和以前所取得的许多成果一样，是他们坚持以调查、研究为工作重心，为中国民俗学学术发展所作出的新奉献。

这两部民俗文化志基本以村落或街镇为时空单位，在写作理念上是前后一致的，即都是通过实地的考察和访谈，力图对一个村落或街镇的生活景象和有形无形的文化传承进行个性鲜明的描述与追忆。这样的民俗志其实是编写者与当地父老乡亲们一起交谈而共同完成写作的，只不过是要求编写者需具有一定研究的眼光并且承担起社会大众推介的责任而已。所以，民俗志并不仅是对于民俗资料的收集，甚至也不仅是民俗学者们独自使用的学术表达工具，而是对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们“斩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情结的一种关注和记述，是通



序
言

过这种记述来加强人们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深切感受我们共同拥有而又分别承担的文化传统。当然,这是每一个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都可以言说的传统,是有关生活体验、归属感、亲情感、理想和诉求的传统。

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当代民俗志的写作必然拥有广阔的选择余地。北京民俗博物馆的这两部民俗志书就打破了以收集资料为目的的写作模式,即打破了一般志书分类体系的统一要求,为凸显一个地方的村落社会独特历史,在对话和理解的基础上着重记述了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历史、刻骨铭心的往事、挥之不去的老街和人物的印象等等。所有这些记忆,既是当地社会需要保留的,也是需要讲给所有外来客人和关心他们的人的。

当然,我们眼前的这部《东坝民俗文化志》,也是提供给学术界同仁来阅读的,因为就其个案描述中所贯穿的一个问题意识来说,它特别关注了乡土中国的传统集市和街镇的经济活动,以及人们在其中的作为。因此,它在华北经济史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以使学者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能够多少了解民俗学关注人们切身感受及文化表达的视角。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傅衣凌、梁方仲等先生就已经开展了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海内外学者的努力,中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无论在史料的积累,还是理论的建构方面,都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在这些研究中,施坚雅的区系理论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早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范式。施坚雅在对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把不同



的基层市场视为层级性的连续体，将农村集市网络概括为“市场共同体”一说，并将其解释为地理学的正六边形结构。他不仅仅将中国农村市场结构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同时还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加以审视。他认为市场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存在，也决定了中国国家对区域的依赖，因此中国的研究应以区域中的市场级序为中心。施坚雅的理论对于我们从市场和城乡结构的角度来研究各地方社会的民俗无疑是一种启示。

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①也就是说，村落民众的生存是离不开物物交换的，每一个村落都是存在于一定的市场体系中。当农民介入到市场体系中，他们的行为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必须为获利而思考和选择。这种市场体系，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商品交换上的往来，也影响到了农民的人际网络的构建，甚至塑造了他们整体性的生活网络。所以，对中国农村的民俗调查，不仅要着眼于村落生活，而且应该看到农民生活在一个“基层市场社区”之中；不能将村落视为孤立的

^①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封闭空间，而应把它作为一定的市场体系的环节。

本书的调查研究对象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东坝，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村落，而是建立在一定村落共同体基础上的街市聚落。这一聚落在行政区划上被定义为“镇”。明清以来，“镇”的形成多是由经济活动的发展而来。东坝镇更是形成于京畿地区的市场体系当中，由于它曾是国家掌控的漕运河道上的重地和马政的所在，因而具有了政治地理上的传统优势地位，也依托这种地位及其象征资本终于在京城东郊变成了以粮食集散功能为主的一个商贸纽带。在民国年间，在东坝设镇和派出所等在行政建制上的提升，是正式的国家区位行政体系与非正式的市场体系相适应的体现。而东坝“镇”区划的消失，也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地市场经济地位的一时衰退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东坝镇上，有一个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地名概念——“大街”。这条街上汇集了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买卖店铺，东坝本地的十日三集也是此街为中心。人们在这里生产和交易生活用品，谋生计、跑饭辙。民间花会表演也在这里走街。尤其对于镇域所囊括的东风、后街、西北门以及镇子左近的南岗子、辛庄等村落的村民来说，以市场为中心的街道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而其本身所居住的村庄却渐被边缘化。所以，东坝镇实际上体现了十分明显的市场共同体的特征。

我们从书中可以发现，东坝在北京东部近郊区的流通网络中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一方面，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京城，



从而在村落、集镇与京城之间形成一种循环式的市场流通渠道。

基层市场社区的权力结构与该结构对市场的控制不可分离。这种控制往往体现为“非正式的政治行为”。这种非正式政治的组织可以是商人、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宗教团体等各种民间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在我们看来，在东坝镇上发生这种“非正式的政治行为”的地点和组织机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地的“斗局子”。作为具有官府背景的牙行，斗局子对于当地粮食生意的掌控，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官方对于市场体系的掌控，即通过经济利益上的共谋来形成对于地方政治建构的强大影响。

基层市场社区的意义除了经济层面之外，还在于影响到了地域的神圣空间的建构。东坝镇上曾有大大小小30多座庙宇，仅与商户有关的关帝庙就有8座之多。与周围的村落相比，东坝也拥有一定文化中心的地位。镇上庙宇的信众不仅来自本镇所辖的村落，也有来自市场辐射范围的远方村落，这种信仰仪式空间与市场体系级序相适应的情况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本书最可贵的取向，就在于它是在民俗学界方兴未艾的村落调查道路上比较早地开展了集镇调查。我曾经在为北京民俗博物馆之前出版的《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的序中强调了对于北京郊区村落调查的重要性。我注意到，高碑店村的民俗志写作虽然基本上囿于传统村落研究的范畴，但已经部分涉及该村所具有的一定的集镇性质。而这本书的写作则是更进一步，把对传统中国村落的关注，迈向村落以外的集镇和经济网络。

将调查地点和所在区域结合起来，解释生活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是民俗学调查的基本学术取向。我们注意到，历史上京畿地区的行政设置，并没有完全与经济地理的级序相吻合。比如本书记述的东坝，它在历史上先后隶属于大兴县、通县，一直处于行政区域的边缘。但是这并没有限制住东坝地区重新成为北京东部近郊的经济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东坝所在的北京东部近郊设为朝阳区，谁曾料想，其地方经济在新时期又取得了空前的飞跃，而这种飞跃却是与其历史上的地位一脉相承的。

回过头来说，《东坝民俗文化志》可能具有的价值虽然在于上述的编写者们的历史问题意识，但是如果离开他们大胆进行民俗志写作模式的创新实验，那么这种问题意识也就不容易显现出来。由于这部书在材料的取舍上比较讲究，特别是能够将具有地方文化标志性意义的民俗事象作为重点叙述的对象，如对于“大坝马房堡子北门金铃祖狮”等东坝“八大会”的描述，所以就将东坝人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释怀的特殊记忆和地方认同感如其所是地传达出来。既然是创新，读者们当然会看到这部书还有一些不够成熟之处，比如，在章节标题的设计和有些民俗事象的描述上还没有完全地突出地方特色。不过这毕竟是在前进中出现的问题，比那种墨守成规的“成熟”还是要高明得多。

我以为在今天，没有谁是完全不离开乡土社会的人，也没有谁是完全离开乡土社会的现代人，所以不必过分强调谁来保护谁的问题。比如我们和东坝人所讲的过去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之间却需要互相述说，互相倾听，因为我们都是现代人，又都有



不可能斩断的乡土情结！从事民俗学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为此，我们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师生要特别表达对于北京民俗博物馆的衷心感谢，因为有在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这一次《东坝民俗文化志》的调查和写作，她们受到了馆领导和年轻伙伴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更在各种对话当中获得了学习和自省的机会。

是为序。



目录

01 序言

01 第一章 概说（关昕）

02 第一节 东坝地理概貌及历史变迁

21 第二节 地方民俗概貌与特点

31 第二章 昔日的繁华：东坝的商贸活动（林静）

32 第一节 “一百零八家”商铺

37 第二节 各具特色的买卖行业

50 第三节 会馆与商会

55 第三章 粮食牙行“斗局子”（程安霞）

57 第一节 “斗局子”的运营

68 第二节 “斗局子”的兴衰

77 第四章 有集和没集的小本经营（田莉莉）

79 第一节 有集赶集

86 第二节 没集照样讨生活

111 第五章 关于庙宇的历史记忆（王媛）

113 第一节 记忆中的庙宇

119 第二节 从普惠生祠到“财神会”

125 第三节 声名显赫的娘娘庙

135	第六章 “天下第一”的金铃祖狮（李超）
136	第一节 东坝“八大会”
149	第二节 受皇封的狮子
159	第七章 东坝票房“憩余同乐社”（杨英）
160	第一节 票房的兴起
164	第二节 “玩票”的规矩
173	第八章 日常生活里的大事小情（王均霞）
174	第一节 节日春秋
181	第二节 婚丧嫁娶
191	附录一
235	附录二
251	后 记

第壹章

概说

第一节 东坝地理概貌及历史变迁

一 东坝的地理概貌

在文献和口述中,“东坝”有两个地理含义:一是指东坝乡,一是指东坝镇。本书是以后者作为考察对象。

东坝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北部,居日坛东北偏东11.7公里。目前下辖驹子房村、七棵树村、西北门村、后街村、单店村、东风村、焦庄村、三岔河村、东晓景村9个村委会,以及东坝家园、大街、红松园、十六局、高杨树、康静里、朝阳新城、奥林匹克花园8个社区居委会。其中的东风、后街、西北门3个村委会所辖村境为昔日东坝镇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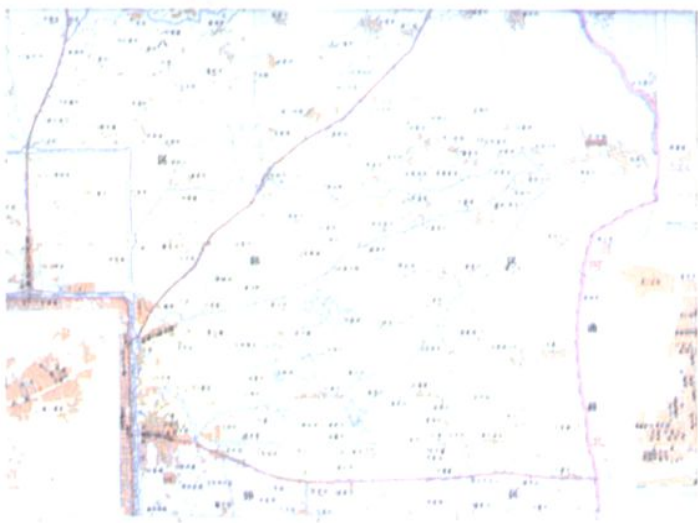
东坝乡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24~30米,聚落海拔约29米。土壤以褐潮土为主,耕层土质肥力中等。气候类型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燥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降雨多集中在七八月间。东坝乡境内主要河流有坝河、北小河、亮马河等。坝河由南石家村西北进入乡域,横贯乡域中部。北小河于东坝北部流入乡域,至三岔河附近汇入坝河。亮马河由七棵树西北流入乡域,经西坝于南岗子北汇入坝河。东坝乡因乡政府驻地东坝(镇)而得名,明清时期其区域先后属顺天府通州、大兴县境,民国时期先后属北平东郊区、郊一区,1953年设乡,1958年撤乡立社,东坝乡为朝阳区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翌年成立中德友好人民公社。1983年恢复乡建制。

东坝(镇)位于东坝乡乡域北部,东邻三岔河,西靠北岗子,

南与辛街村接壤，北隔北小河与北马房相望。坝河由西向东流经镇南，北小河由北向南流经镇东，两河于镇东南0.6公里处交汇，后注入温榆河。东坝（镇）区域面积9.1平方公里。1947年，东坝被设为北平市郊一区辖镇。1949年8月，东坝为北京市第十三区下设镇。1953年6月，东坝镇的建制被撤销，所在区域被纳入东坝乡。



东坝乡域图



1948年北平郊一区地图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以东坝镇为研究对象，并不是完全拘泥于作为基层行政区划的“镇域”范围，而是侧重从本地生活和商业的自由逻辑与发展史出发，讨论作为生活空间的“镇”。因此，在下面各章的讨论中，可以涉及与镇上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周边村落，它们与东坝镇上的人们形成了整体性的生活网络。

二 东坝的历史变迁

东坝与汉安乐城

东坝与北京历史发展紧密相关，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东坝位于河流纵横之地，水源丰富。优越的地理环境为人们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条件。秦汉时，北京东北部地区已设郡管辖，说明当时其地域已有人口和聚落。当地人传说，蜀后主刘禅降晋后封安乐县公，曾居于此，时名安德乡。其乡得名由何，史籍无考。但后世地方史志中认为安德乡即是汉之安乐故城。^①不过，据当代学者考证，汉安乐故城非在今朝阳之东坝，其在历史上有过城址变迁，于魏景初二年（238年）因政区调整，由今顺义县西南的古城村迁移至顺义县西北的衙门村，^②蜀后主刘禅所居当为后者。^③

虽然东坝是否为“汉安乐城”存在争议，但汉代东坝地区已有聚落却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80年代曾于东坝镇东南的三岔河村北侧发掘出土十余件汉代陶器皿，其中有弦纹灰陶壶、灰陶仓、灰陶博山炉、灰陶鼎、灰陶豆等完整器物及大量灰陶片。据考古人员勘查证实，在当地数百亩范围的台地上存有汉墓群，现

① 此说的代表人物为刘锡信和缪荃孙，详见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屯镇》，1929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② 尹均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郝志群：《北京历代建置沿革》，6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徐兆奎：《北京附近几个汉魏古城位置的商榷》，见北京史研究会：《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80页，内部发行，1982。

③ 郝志群：《北京历代建置沿革》，6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